冷战时期联邦德国促使北约“双重决议”萌芽的原因

刘 芝 平
(南昌航空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63)

[摘 要] 20世纪 70年代后期,由于苏联部署 SS-20导弹,北约与华约的核均势遭到破坏,直到北约落实“双重决议”后才得以重新恢复。而“双重决议”又是在联邦德国的推动下萌芽的。文章对其原因进行了探讨,并将之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均势战略是施密特总理促使双重决议萌芽的理论依据;第二,欧洲核平衡的破坏和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及其自身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迫使联邦德国积极寻找对策;第三,联邦德国民众对苏联人的不信任及其比例的提高为施密特对华约采取强硬政策提供了民意支持。

[关键词] 冷战; 联邦德国; 北约; “双重决议”
[中图分类号] K1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0)04-0056-04

20世纪 70年代中期,华约与北约军事力量特别是战略力量方面势均力敌,但在 1977年苏联决定部署 SS-20导弹后被打破。在此情况下,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于 10月 28日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演说,呼吁西方采取对策。他指出,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均势是西方安全的前提,但是由于苏联部署了 SS-20导弹,欧洲的军事平衡发生了质的变化[1];在德国人看来,光谈对洲际战略武器的平衡和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进一步增加限制的前景,而不对苏联的 SS-20导弹实行任何限制的话,会对他称之为“欧洲战略”核力量的均势产生消极影响[2]。他强调,这些导弹是以西欧为主要目标的,因此,有必要部署适当的武器进行反击[3]。从演说的内容可以看出,施密特的意思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谈判对苏联的这类导弹加以限制,另一方面采取一切威慑手段特别是部署适当的武器予以反击。实际上,这是一个双管齐下的对策。正因为如此,这篇演说被西方当作北约 1979年所制定的双重决议的萌芽,施密特总理成了对东西方力量均势的失衡状况提出警告并呼吁采取措施重建均势的第一位北约国家领导人。施密特之所以发表演说从而使双重决议得以萌芽,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 施密特总理是均势战略的积极宣传者和实践者,均势战略是他促使双重决议萌芽的理论依据

施密特之所以成为均势战略的推崇者,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对苏联及其传统的认识。在他看来,苏联的外交政策和总战略在许多方面始终是从 16世纪开始的,是沿着 17世纪直至 18、19世纪旧俄国政策的直线继续和延伸的。说得粗略一点,莫斯科的总战略过去和现在都是 3/4的传统俄国战略,1/4的共产主义战略。至于苏联的具体战略,施密特将之归纳为从历史上继承的源于救世主义的对外扩张战略。他说,“不管是伊凡四世、彼得一世统治时期,还是叶卡特琳娜二世、斯大林、赫鲁晓夫或是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俄国向外扩张的欲望尽管遭到某些挫折,但从未真正熄灭过。其根源是存在一种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救世主义,它是俄罗斯国家意识中内存的思想。当君士坦丁堡于 1453年被土耳其人征服,从而使奥斯曼帝国的中心脱离基督教时,莫斯科宣称自己是‘第三个罗马’,而第四个罗马永远也不会有。救世的信念在 19世纪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即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泛斯拉夫主义,而二十世纪它又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世界革命的共产主义出现。”[4]9-10他特别阐明,苏联领导人患有一种俄罗斯安全综合症。施密特引用沙皇时代一位大臣的话说,俄罗斯“只有当边界两侧都有俄国士兵站岗的时候”,才会感到“俄国的边界才是安全的”。斯大林时代的政策则是在周围建立一个由卫星国组成的弧圈,这一政策导致了杜勒斯在欧洲、中东和远东建立美国的联盟体系,以作为西方的“防疫地带”。这反过来又被俄罗斯看作是危险的包围圈。

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施密特指出,从历史上认识俄国扩张的连续性,并不意味着相信地缘政治决定论。他更相信,这是一种政治文化传统,这种传统从未放弃过最初源自俄罗斯东正教,后来被苏联共产党吸收并继承下来的那种使命感[4]14-15。苏联就是传统地依靠强权政治,与这一传统结合在一起的是一个官僚政治控制的革命理论;这个混合体,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给世界政治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所以人们进行估计时必须始终把苏联行为的基本因素考虑在内。如果一个人不这么做,不从苏联所处地位去考虑问题,就会

[收稿日期] 2010-03-16
[作者简介] 刘芝平(1972-),男,湖南衡东人,南昌航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发现他的努力不仅是无效的,而且实际上是危险的。由于这个原因,“对我们来说不仅需要对苏联的行为作一个彻底的分析,还要对苏联的军事和政治能力作一个估计。对西方同等重要的是,永远不要忽视自己的能力和目标。”[5]21-22如果在争取缓和的同时,不重视为自己提供必要的军事防御,那仍旧是愚蠢的;如果低估在一场旷日持久而漫无限制的军备竞赛中可能遇到的种种危险,则仍旧是不负责任的[5]15。

基于此,施密特强调,必须在东西方之间实施均势战略。他所说的均势指的是保持军事力量的均衡,即西方联盟的紧密结合和防务能力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与华约的实力旗鼓相当[5]206。施密特还认为,欧洲安全的关键在于不仅要同苏联的地面部队保持均势,而且也要同苏联的导弹保持均势[4]36。均势建立得越稳固,每一方越能牢固地掌握他们现在所占有的东西,也越能加强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至于“均势战略”中所说的战略有它自己的含义。施密特曾在《均势战略》一书中说,在他看来,战略不是属于一种军事范畴,而是属于一种对外(或世界)政治的范畴……是政府的事情。总之,均势战略往往会变成一种维持现状的战略;因为谁要改变现状,他就要负破坏均势的责任。关于均势对联邦德国的重要性,施密特指出,欧洲均势是政治稳定的一个必需条件,而政治稳定又是安全必须有的基础。只有预先规定均势的必要,才能够发展有关将来的欧洲安全体系的有意义的设想[5]225。正因为如此,联邦德国将均势战略视为安全政策。

由于推崇均势并将之视为安全政策,所以当苏联部署 SS-20导弹后,施密特认为这种行为极大地破坏了欧洲均势,危害了欧洲安全,呼吁西方采取相应对策。

二　欧洲核平衡的破坏和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以及自身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迫使联邦德国积极寻找对策

20世纪 70年代中期,北约与华约在欧洲的战略力量大体均衡。其中,陆基洲际导弹:华约 1594枚,北约 1054枚;陆基中程导弹:华约 600枚,北约 48枚;潜艇导弹:华约 696枚,北约 768枚;战略轰炸机:华约 460架,北约 400架;中型轰炸机:华约 600架,北约 96架;带核弹头的导弹:华约 3420枚,北约 6794枚;战略核潜艇:华约 73艘,北约 41艘[6]。这些对比表明,华约占优势的战略武器项目比北约多,在七个项目中,它占优势的就有陆基洲际导弹、陆基中程导弹、战略轰炸机、中型轰炸机、战略核潜艇五个,但是,在这些项目的任何一个方面,华约都不占压倒性优势;相比之下,北约虽然占优势的项目只有两个,但它在其中的“带核弹头的导弹”的数量上却占压倒性优势。综合优势项目和优势数量来考察,两者的战略力量势均力敌。

但是,这种平衡局面很快发生了变化。1977年,苏联决定并开始在欧洲部署 SS-20中程导弹[7]。SS-20导弹在技术的复杂性、精度、可靠性、生存能力、移动性、射程等方面都超过苏联此前大量部署的 SS-4和 SS-5导弹[8]。具体来说,在技术的复杂性上,每枚 SS-4或 SS-5导弹只能携带一个核弹头,而每枚 SS-20导弹却可以运载 3个核弹头,其中每一个弹头又可以单独引向另一个目标。这就是说,每枚 SS-20导弹可以同时毁灭 3个不同的目标;在精度上,SS-20导弹的目标误差小于 300米[9],这比起 SS-4和 SS-5导弹来说已经大大提高了;在生存能力上,旧的 SS-4和 SS-5导弹发射架发射一枚导弹后即毁坏,而 SS-20导弹发射架却可以补充装填,它可以发射更多的导弹;在机动性上,旧的 SS-4和 SS-5导弹发射架是固定在一个地方的,而新的 SS-20导弹发射架是机动的,因而很难被西方的武器击中;从射程来看,SS-4和 SS-5导弹的射程分别只有约1200和 2300公里[10],而 SS-20导弹的射程可达 5000公里[11]。因此,向西发射的 SS-20导弹虽然不可能越过大西洋,但与 SS-4和 SS-5导弹相比,它们可以部署在东部更远的地方,甚至可以从乌拉尔以东的地方击中西欧领土上的所有目标。

由于发射阵地的东移,SS-20导弹对部署在欧洲的美、英、法核武器来说是不可及的,它们只能由美国的洲际导弹加以破坏。但自从达成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以来,美苏之间已建立了均势,不能指望美国能用它的洲际导弹来摧毁苏联的 SS-20导弹。

而 SS-20导弹核弹头属于大当量核武器,每枚当量达15-20万吨。由于性能先进,SS-20导弹能准确地摧毁加固的军事目标,弹头的当量和射程都足以摧毁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或者欧洲的任何一个军事目标。不仅如此,苏联还以每月 8枚的速度在欧洲部署这种导弹[4]60。这就意味着,苏联每月在欧洲部署的 SS-20导弹的总爆炸当量相当于 120-160万吨。在这种情况下,联邦德国对苏联部署 SS-20导弹的行动不可能不予以高度警惕。早在 1970年 12月,联邦德国就组织力量对核武器的破坏力进行了充分的研究。据《南德意志报》报道,在魏茨塞克教授的领导下,一批联邦德国学者经过长期的研究得出结论,22枚百万吨级的炸弹可以把 1000万(联邦)德国人置于死地,200枚就可以毁灭 5000万(联邦)德国人。也就是说,苏联如果对联邦德国发动核打击的话,它可以用两年时间内部署的 SS-20导弹就可以杀死 1000多万联邦德国人。这对联邦德国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因此,对处于东西方对抗前沿的联邦德国人来说,即使北约和华约两大集团在欧洲的核力量保持平衡,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也不能不引起他们的重视,更何况苏联在 1977年部署 SS-20中程导弹后,欧洲的核平衡遭到了破坏,核天平已向华约一方倾斜。

在这种情况下,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率先主张,北约必须对苏联部署 SS-20导弹的举措作出强有力的反应。1977年 5月,当美国与苏联举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作出让步、同意把远程巡航导弹纳入战略核武器范畴时,施密特表示强烈不满[12]。巡航导弹尽管是美国正在研制的武器,但施密特认为它是西方赖以抗衡苏联 SS-20导弹的重要武器,因而对美国的谈判方针表示忧虑。他一开始就认为,美国忽视苏联在中程核武器领域的扩军可能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动机:第一,美国担心部署在欧洲的一部分核武器也被纳入谈判;第二,为了照顾英、法两国的核武器;第三,美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国只打算减少对其本土的战略威胁,并且不愿意由于照顾欧洲的安全利益而在这方面受到干扰[4]174。当自己的忧虑没有引起美国的重视后,施密特断定,第三个动机在美国是起决定作用的。为了维护本国安全,施密特在7月中旬访美期间,要求卡特总统或者把苏联的SS-20导弹也纳入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内容,或者不把巡航导弹纳入谈判中。他还表示愿意充当中间人,并向勃列日涅夫进行试探。然而,卡特并没有接受施密特的建议。

同年9月,施密特又花了大量时间向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说明联邦德国以及被分裂的德意志民族所处的战略形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着重强调苏联迅速扩充的SS-20导弹对联邦德国构成的威胁。与以往一样,施密特的谈话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布热津斯基表示,这一切根本与波恩无关,说这是美国的事,倘若联邦共和国在某个时候受到苏联SS-20导弹的压力,美国可以用它的战略核武器来对付。卡特赞成布热津斯基的意见,表示不理解施密特的担忧。这样,就促使联邦德国采取进一步的举措,从而促使施密特总理发表演说,进而使双重决议得以萌芽。

三 联邦德国民众对苏联人的不信任及其比例的提高为施密特对华约采取强硬政策提供了民意支持

由于处于东西方对抗的前沿,受长期冷战及其它因素的影响,联邦德国民众对苏联不信任的比例长期居高不下。1974、1977年,有关机构按照16-19岁、30-44岁、45-59岁和60岁以上四个年龄段分组,调查了联邦德国民众对"你是否相信苏联人有了解西方的诚意或苏联人对了解西方持友善态度吗?"这一问题所持的看法。详情见下表:

回答	年龄段(岁)	1974年(%)	1977年(%)
相信	16-29	37	32
	30-44	35	31
	45-59	26	25
	60+	19	20
不相信	16-29	44	53
	30-44	52	57
	45-59	60	63
	60+	64	67
不知道或	16-29	19	15
没有表态的	30-44	13	12
	45-59	14	12
	60+	17	13

资料来源:1.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Allensbacher Jahrbuch der Demoskopie 1976, Munich: Verlag Fritz Mdlden, 1976 2.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Allensbacher Jahrbuch der Demoskopie 1977, Munich: Verlag Fritz Mdlden, 1977.

从上表可以看出,1974年,回答"相信"的人在各个年龄段的最高比例只有37%,最低则只有19%[13]。而且年龄越大,回答"相信"的人的比例越低。相反,回答"不相信"的人的比例最低也有44%,其它三个年龄段则都超过了一半[14]。到1977年,有关机构就同一问题进行了调查。结果,回答"相信"的人的最低比例虽然相近,但最高比例又下降了5个百分点;回答"不相信"的比例都增加了,最多的增加了9个百分点,而且所有年龄段的这一比例都超过了一半,最高比例则逼近70%。这些调查结果表明,联邦德国民众对苏联人表示"不信任"的比例不仅高,而且这一比例在苏联1977年开始部署SS-20导弹后进一步增加了。这样,就为联邦德国针对苏联部署SS-20的的行动采取强硬政策提供了民意支持,这也正是联邦德国促使"双重决议"萌芽的重要原因。

由于以上原因,联邦德国促使北约"双重决议"萌芽。此后,北约专门成立了"高级小组",研究应对SS-20导弹的对策,最终于1979年通过了"双重决议"。由于决议规定,一方面由美国出面,力争与苏联就尽快限制欧洲中程导弹问题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如果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话,北约将从1983年12月起在西欧盟国中的5个国家部署464枚陆基巡航导弹和108枚潘兴II型弹道导弹,所以"双重决议"实际上是施密特演说所呼吁的对策的具体化。

"双重决议"的实施对北约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使北约恢复了与华约的均势。具体来说,"双重决议"从两个方面重建了均势,也就是通过部署中程导弹恢复均势和通过部署中程导弹迫使苏联在中程导弹谈判中让步并最终销毁中程导弹来恢复均势。以后者为例。从1981年11月30日起,美苏就中程导弹问题举行正式谈判。北约正式实施"双重决议"之后,苏联于1983年11月23日从谈判中退出,他们发誓,如果北约不把潘兴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撤走,他们就不回到谈判桌上来。在北约部署中程导弹并无意撤走的情况下,苏联被迫在1985年3月12日恢复军备控制谈判。此后,双方在消除中程导弹问题上的立场日益接近。1987年12月,美苏两国终于达成了销毁全部中程导弹的协议。可以说,北约如果在此之前没有部署"双重决议"规定的中程导弹,那么苏联就可能不会销毁其中程导弹,北约也就不可能重建与华约的均势。因此,联邦德国在均势重建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参考文献]

[1] Helmut Schmidt. The 1977 Alastair Buchan Lecture[J]. Survival, 1978(1): 1-6.

[2] Cyrus Vance. Hard Choice: Critical Years in America's Foreign Policy[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Inc, 1983: 67.

[3] Carl H. Amme. NATO Strategy and Nuclear Defense[M]. New York,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Greenwood Press, Inc, 1988: 24.

[4] (联邦德国)赫尔穆特·施密特. 伟人和德国——施密特回忆录[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5] Helmut Schmidt. The Balance of Power: Germany's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Peace and the Super Powers [M]. London: William Kimber& C. Limited, 1971.

[6] Weissbuch 1975/1976, Herausgegeben vom Bundesminister der Verteidigung Seite 74.

[7] Caspar Weinberger. Fighting for Peace: Seven Critical Years at the Pentagon [M]. London: the Penguin Group, 1990: 235.

[8]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7- 1978[R].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7: 77.

[9] 周　琪, 王国明. 战后西欧四大国外交[M].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2: 110.

[10]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8- 1979[R].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8: 81.

[11] David Gress. Peace and Survival: Germany, the Peace Movement, and European Security[M].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5: 70.

[12] 潘其昌. 走出夹缝[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273.

[13] Elisabeth Noelle- Neumann, Allensbacher Jahrbuch der Demoskopie 1976, Munich: Verlag Fritz Mdllen, 1976: 281.

[14] Elisabeth Noelle- Neumann, Allensbacher Jahrbuch der Demoskopie 1977, Munich: Verlag Fritz Mdllen, 1977: 134

The Reasons of the Budding of NATO's "Dual- Track" Solution by the Urged of the FRG

LIU Zhi- ping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63,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of 1970s, the balance of nuclear power between NATO and the Warsaw Pact in Europe had been damaged because of the deployment of SS- 20 by the Soviet until the "dual- track" solution was put into practice. And the "dual- track" solution was in its infancy under the impetus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and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asons of the thing. There are there reasons. Firstly, the strategy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that Prime Minister Schmidt promoted the dual resolution shoot. Secondly, The damaging of the balance of nuclear power, the devastating effects of nuclear weapons, and its own special location forced the FRG to seek countermeasures actively. Thirdly, German public's distrust in the Soviets supported Schmidt's hard policy toward the Warsaw Pact.

Key words　Cold War; the FRG; NATO; the "Dual- Track" Solution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